

独生子女:媒介负面形象的建构与实证^{*}

风笑天

提要:论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大众媒介新闻报道中的独生子女形象进行了系统解读。结果表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中的独生子女主要是一种负面形象。通过将相关调查统计结果与媒介建构的形象进行比较,本研究发现当前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客观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论文进一步对媒介新闻的形成方式、叙事逻辑和所用材料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妖魔化”倾向。

关键词:独生子女 大众媒介 新闻报道 刻板印象

一、问题与背景

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生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它们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力、影响力越来越强,对人们认识和观念形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媒介通过描述说明而提出的对现实的解释有潜移默化其受众的作用。人们可以从所读到、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发展出对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及公认的意义构想”(德弗勒、鲍尔-洛基奇,1990:42)。随着人们对从大众媒介中获取信息的依赖性增加,其所建构的各种“社会现实”,即“媒介现实”,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受众头脑中的社会现实。“‘媒介现实’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来源”,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判断及采取的行动,大都以他们看到、听到的媒介现实为

^{*}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6JZD0027。笔者感谢参与项目调查的众多老师和同学,感谢笔者的研究生孙含钰、王晓焘协助笔者进行网络文献的查找、编码和录入工作。当然,文中的错漏之处完全由作者自己负责。

依据”(张国良 2001:63)。

独生子女(only child)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自一百多年前在西方各国开始大批出现以来,对他们的认知和评价就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方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学者普遍意识到,在社会舆论、传统以及民间,存在着一种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负面刻板印象。“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奉行的信条之一就是,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相比,独生子女具有某种‘不良后果’”(Claudy et al., 1984)。“‘众所周知’独生子女受宠爱、孤独以及不适应环境。来自联合国多方面的调查显示这种偏见根深蒂固”(莱本, 1994)。“社会调查发现,社会对自愿无孩的个人以及独生子女的父母的评价最为负面”(Polit, 1978)。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人已为民间有关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否定性陈旧偏见所引导”(Cooper et al., 1984)。而“由于公众舆论如此消极地看待独生子女,因此大多数人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原因,就是为了不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Falbo, 1984)。

我国的独生子女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在社会中的一代特殊人口。30年来,他们的发展状况和成长过程一直为学术界、大众媒介以及整个社会所关注。关注的中心同样是对独生子女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中国独生子女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在独生子女人口产生初期,较多的研究结论都延续了西方“问题儿童”的观点,认为独生子女是具有这样或那样性格缺陷和行为问题的孩子。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学术界的成果却并不支持这种负面的评价,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之间在个性特征、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别(风笑天, 2002, 2005)。而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各种认识和评价虽然处于一种偶发的、零散的、不系统的状态。但总体来说,其页面的评价是明显的。

留美学者黄刚曾经批评美国的舆论和大众媒介说“美国社会舆论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存有相当严重的偏见。人们凭‘常识’相信独生子女多少有‘病态’或反常的情感与行为特征,大众媒介对此的宣传也有点夸大其词”(黄刚, 1990)。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社会舆论会不会同样存在西方社会那种对独生子女的偏见?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是什么?这种形象是否反映了客观现实?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

二、文献回顾

针对社会舆论以及大众媒介中存在的对独生子女的偏见和负面刻板印象,西方的许多研究都提出了批评(Polit, 1978; Blake, 1981; Falbo, 1984)。研究者往往以某种社会舆论(比如民意测验的结果、“公众的看法”、“民间的偏见”、“传统的偏见”等)作为前提,然后通过开展各种经验研究去质疑和挑战它们。但是目前还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存在于大众媒介之中的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各种偏见的经验证据的成果。

国内的独生子女研究一直关注于独生子女一代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风笑天 2002),涉及社会舆论及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认识和评价的文献仅有三篇,其中两篇来自同一项研究课题。该研究从心理学角度,采取形容词自由联想法和社区调查,筛选出与独生子女群体相关的15个高频形容词。其中5个具有正向积极意义(自信、漂亮时尚、物质条件好、聪明、有个性),10个具有负向消极意义(自私、社交性差、骄傲、孤独、依赖、浪费、任性、娇惯、爱发脾气、自我中心)。在此基础上,研究者编制了态度量表,并在上海市对有9-18岁子女的父母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研究者让调查对象用上述量表对独生子女群体的符合程度进行评价。调查结果表明,在1088份父母问卷中,分值最高的5个与独生子女群体相关的形容词分别是“依赖”、“任性”、“娇惯”、“自我中心”和“爱发脾气”,均为消极意义。研究结论是:“在与独生子女有直接接触的城市居民中,独生子女群体的社会印象以负面刻板印象为主”(包蕾萍 2008a 2009)。

该研究还探讨了这种负面印象的形成机制,着重分析了父母生育观对独生子女刻板印象的影响,逐步回归的结果显示,父母生育观和子女性别是影响独生子女刻板印象的最为重要的两大因素(包蕾萍, 2008a)。但问题是,父母的生育观念与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印象之间存在相关,并不能就肯定是“父母的生育观念”影响了“父母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印象”,或许倒是“父母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印象”有可能影响到“父母的生育观念”。另外,该研究也没有解释父母对独生子女的这种负面印象来自哪里,只是指出,“这方面的实证资料目前还相当有限,急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包蕾萍 2008a)。

另一篇是风笑天 2005 年针对大众媒介中的观点,对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社会适应问题所进行的探讨。该研究通过对全国 12 个城市 1786 名在职青年调查结果的定量分析,得出了与当时的媒介宣传和社会舆论不一致的结果,即在职青年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在社会适应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别。提出了“应该对现有认识和媒介宣传进行反思,并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独生子女的这种偏见”的看法(风笑天 2005)。但是,该研究的有关观点和看法仅仅来自于对媒体上一些典型报道的印象,并没有去系统收集和分析大众媒介中的经验证据。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思路

笔者首先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大众媒介中有关独生子女的新闻报道进行系统的、定量的分析,从总体上描述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所持有的评价倾向;其次,针对大众媒介的普遍认识和看法,通过收集现有统计数据,并开展实地调查,说明媒介的认识评价与社会现实之间是否存在差距;第三,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报道,对其报道独生子女的方式、材料和推断的逻辑作定性分析,以考察媒介新闻得出某种评价倾向的特定机制,揭示媒介新闻报道方式与独生子女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

(二) 媒介新闻的内容分析设计

首先,媒介新闻的抽样。大众媒介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媒介资料的全面性和可得性,本次分析的样本取自新浪网的新闻搜索系统(预先的探索性搜索结果表明,在百度、谷歌等搜索系统中所得到的结果与新浪中得到的结果基本相似)。具体操作步骤是:在新浪网“爱问”搜索系统中选择“新闻搜索”,关键词为“独生子女”,限定搜索时间为“1998 年 7 月 10 日到 2008 年 5 月 12 日”(由于该系统每段时间只保留容量为 88 页、每页 20 条的信息条目,所以我们分别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和 2008 年 5 月 12 日进行了两次搜索),查询关键词位置为“在新闻标题中”,并默认全部新浪网新闻源作为我们的搜索源。搜索结果显示“找到 9180 篇新闻”,但是实

际上搜索到、且能看到的新闻只有 3520 篇。我们估计显示的结果中是包含大量重复新闻在内的,如“‘85 后’独生子女遭就业歧视,不能吃苦成代名词”一则条目即显示有“41 条相同新闻”。

在搜索到的 3520 篇新闻中,既包含了大量与我们研究主题无关的新闻,同时也包含了标题稍有改变而内容完全相同的新闻。为此,我们首先对所得结果逐条进行审核和筛选。根据研究目标,我们只选择其中对独生子女(群体、家庭)进行描述报道、议论、评价的新闻作为我们的分析样本,而将下列各种情况的新闻剔除:1. 报道独生子女政策的新闻。如《贵州出台规定:办理独生子女证,不能超过一个月》、《个体户怎么领取独生子女费》等;2. 报道独生子女人口统计的新闻。如《中国已累计出生 9000 万独生子女》等;3. 重复的新闻。如《独生子女步入消费年龄,第三个消费高峰来临》、《独生子女更爱享受 中国迎来第三个消费高峰》等,我们只取其中一条;4. 少数无法打开的新闻。经过这样的剔除后,我们实际共得到符合要求的新闻 586 条,作为本次内容分析的最终样本。

其次,进行媒介新闻的编码。根据研究目标,笔者共设立了 7 个内容分析的变量,并据此对样本形式和内容进行编码。这 7 个变量及其取值分别是:

变量一,新闻的标题所体现的对独生子女的评价。取值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判断的依据主要根据关键概念及其标题整体含义。比如“自立”、“孝顺”等为正面,“不能吃苦”、“不做家务”、“离婚多”等为负面,“生育意愿提高”等为中性。

变量二,新闻的来源。取值分为:网络和报纸。来源中也出现了极少数杂志,分析时作为缺省处理。

变量三,新闻来源媒体的性质。取值分为:主流和一般。主流媒体指中央媒体、各省、市党委机关报(即 $\times \times$ 日报)及相应的网站,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其他则为一般媒体。

变量四,新闻来源媒体的级别。取值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

变量五,新闻内容所反映的对独生子女的评价。通过阅读新闻报道的内容,根据其对独生子女的评价,取值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

变量六,新闻出现的次数。新浪网如果显示有 10 条相同新闻的话,我们直接计为 10;如果我们自己阅读到相同新闻的话,则在原数据上加上重复新闻数。

变量七 新闻报道中采用的分析方式或手段。取值分为:泛泛而谈、运用个案、运用非正规调查资料和运用正规调查资料四类。如果报道中既运用了个案又运用了调查资料 我们就把它归到运用调查资料一类。

具体的文献搜索、阅读和编码工作由笔者的两名研究生共同完成。为了保证两人之间在阅读同一条新闻后给出的编码具有一致性 ,笔者采取了三种方法:一是先让他们对若干条新闻分别编码 ,然后进行比较 ,找出差别并做相应调整;二是编码时两人在一起 ,遇到拿不准的条目及时商量确定;三是各自编码全部结束后 ,分别从对方编码的结果中抽取一部分进行交换检查。

四、媒介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是什么？

(一) 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的总体评价

我们对新闻标题和新闻内容两方面所反映的媒介对独生子女的评价进行了统计 ,结果见表 1。

表 1 新闻标题和新闻内容所体现的媒介评价				
新闻标题			新闻内容	
媒介评价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正面	72	12. 3	89	15. 2
中性	152	25. 9	86	14. 7
负面	362	61. 8	411	70. 1
合计	586	100. 0	586	100. 0

表 1 的结果表明 ,无论在新闻标题还是在新闻内容中 ,对独生子女的负面评价都占了绝大部分。其比例在 60% - 70% 之间。换句话说 ,在大众媒介的新闻中 ,独生子女更多是以一种负面形象出现的。有研究者(包蕾萍 2008b) 根据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NKI) 的检索 ,查到从 2000 年到 2004 年 2 月 53 篇有关独生子女的报道 ,按所表现的态度偏向性进行分类 ,结果为:正面的 7 篇 ,中性的 11 篇 ,负面的 35 篇。与本研究三种类型的比例分布十分相近。上述两种统计结果都表

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中的独生子女,三分之二左右是负面的形象。

(二) 媒体新闻中独生子女负面形象的主要方面

为了归纳媒介新闻中独生子女负面形象的主要方面,笔者选取了这 586 篇新闻报道中重复次数最多的 20 篇进行分析。由于这 20 篇新闻总共转载次数达到 701 次,占了全部 586 篇新闻总转载次数 2048 次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既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全部新闻内容的一个样本,同时也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全部新闻中传播最广泛、对受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新闻。表 2 是这 20 篇新闻的题目、转载次数及对独生子女的评价。

表 2 的评价结果显示,转载最多的这 20 篇报道中,从标题到内容直接呈现负面评价的 12 篇,间接呈现负面评价的 3 篇,呈现中性评价

表 2 样本中转载最多的前 20 篇新闻的题目、转载次数及其对独生子女的评价

序号	新闻标题	转载次数	评价
1	“80 后”独生子女离婚多	75	负面
2	南京节后出现离婚高潮 离婚者中独生子女比例高	64	负面
3	养老压力大 “80 后”独生子女夫妇生育意愿提高	58	中性
4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支撑中国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53	负面
5	为蹭饭 独生子女结婚愿与父母做邻居	52	负面
6	全国有近 1 亿独生子女 低收入者结婚难度加大	49	负面
7	“85 后”独生子女遭就业歧视 不能吃苦成代名词	41	负面
8	于丹忧心独生子女素质教育 吁小学增加公益教育	28	负面
9	90% 小学生诉父母侵隐私 独生子女有攻击性需要	28	负面
10	中国 9 成独生子女不做家务 一起动手有多难	27	负面
11	高额成本吓退双独生子女夫妇生二胎念头	26	中性
12	城市独生子女靠边站	25	负面
13	河南部分企业招聘卡“出身”不要城市独生子女	24	负面
14	春节:独生子女婚姻“年检”?	24	中性
15	孩子像宠物没学会感恩 新一代独生子女“草莓化”	23	负面
16	六成独生子女夫妻不要二胎	21	中性
17	企业拒聘“城市独生子女”就业歧视折射教育缺失	21	负面
18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迎来婚恋高峰	21	中性
19	双独生子女父母“只生不养”?	21	负面
20	独生子女当父母 会生不会养?	20	负面
	合计次数	701	

的5篇,呈现正面评价的一篇也没有。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媒体新闻中对独生子女以负面评价为主的事实。而将这15篇具有负面评价的新闻标题及其内容综合起来看,它们所表述的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婚姻不稳定,离婚比例高;2、不能吃苦,就业不受欢迎;3、不做家务不做饭,总是到父母家蹭饭;4、不会养育子女,对孩子只生不养;5、性格上缺陷多。

五、媒介建构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社会现实中独生子女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笔者利用相关统计数据 and 具体调查结果对上述独生子女负面形象中的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 独生子女的离婚比例高吗?

由于现有的各种离婚调查和统计都没有加入离婚者“是否独生子女”这一变量,因此,目前尚没有能直接回答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下面笔者尝试利用相关调查和统计数据从逻辑上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推断和证明。

目前进入婚姻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即出生在1976-1985年之间的独生子女)只是同龄人口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说在成年人口中,独生子女离婚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各类人口的离婚比例,那么,应该有下列几种逻辑结果:一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所在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应高于(至少不低于)同一时期其他年龄段人口总体的离婚比例;二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所在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还应该高于(至少不低于)独生子女人口出现以前相同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三是独生子女人口离婚比例应高于(至少不低于)同龄非独生子女人口的离婚比例。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给出了下列统计结果:2007年调查的城市样本中,22-31岁(即1976-1985年出生者,也即第一代独生子女所在年龄段)的人口为46635人,其中离婚者为319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0.68%。而样本中32岁以上人口为197433人,其中离婚者为4363人,占城市32岁以上人口的2.21%(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这一结果表明,从总

体上看,第一代独生子女所在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远低于当时其他人口的离婚比例(不到其水平的三分之一)。即使按每年平均来计算,该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也与32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相当。换句话说,相对于城市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所在的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并不高。因此,媒体关于“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的第一个逻辑结果没有被证实。

下面进行独生子女离婚比例与独生子女进入婚姻阶段之前同年龄段人口离婚比例的比较。方法是我们将2007年数据作为目前的情况,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作为比较数据。由于时间提前了12年,2007年时22-31岁的青年(第一代独生子女所在的年龄段),1995年时只有10-19岁。由此排除了当时22-31岁人口的离婚统计中独生子女因素的影响。那么,当时该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又是多少呢?

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城市样本中,22-31岁人口为516996人,其中离婚者为4169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0.81%;而同一样本中32岁以上总人口为1242469人,其中离婚者为16311人,占城市32岁以上人口的1.31%(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1996)。这一结果表明,1995年,当独生子女人口没有进入婚育年龄时,22-31岁人口的离婚比例与32岁以上人口的离婚比例虽然有一定差别,但相差不大(0.81%与1.31%)。到了2007年,当独生子女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后,人口总体中的离婚者比例提高了将近一倍(从1995年的1.31%提高到2007年的2.21%)。但是将目前22-31岁(独生子女进入婚姻的年龄段)人口与12年前同年龄段人口的离婚率比较发现,2007年该年龄段人口离婚比例比1995年不但没有升高,反而有降低趋势(参见表3)。表明目前人口总体中离婚比例的上升,原因并不在第一代独生子女所在的22-31岁人口的离婚比例提高,而是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提高所致。

表3 城市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

调查年份	22-31岁人口离婚比例	32岁人口离婚比例
1995年	0.81%	1.31%
2007年	0.68%	2.21%

现有文献中各地的调查也给我们提供了与上述全国调查一致的

数据。

上海市宝山区妇联对该区 2000 年和 2004 年各 500 份、共计 1000 份离婚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离婚者的年龄在 20-29 岁的占 33.8% (上海市宝山区妇联 2008)。根据年代计算,这一部分离婚者是在 1971-1984 年之间出生的,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进入到独生子女出生的年代。金美子等对吉林省延吉市 2001-2003 年 4776 份离婚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离婚者中年龄在 20-29 岁的占 30.5% (金美子等 2006)。根据年代计算,这一部分离婚者是在 1972-1983 年出生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同样进入了独生子女出生的年代。上海市民政局最近的一项统计数字则显示出更为直接的证据^①: “2008 年在市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的有 36811 对。从年龄结构看: 30 岁以下办理离婚登记的有 17412 人, 30 至 40 岁之间办理离婚登记的有 22135 人, 40 至 50 岁有 20729 人, 50 至 60 岁之间 11405 人”(周其俊 2009)。^② 根据该统计数据计算,^③30 岁以下离婚者占全部离婚者的比例为 23.7%,而 30-40 岁、40-50 岁离婚者的比例则分别为 30.1% 和 28.2%,均高于 30 岁以下离婚者的比例。30 岁以下的这部分人的出生年代全部是在 1978 年以后,即他们全部进入了独生子女出生的年代。这也即是说,2008 年时上海独生子女人口所在年龄段(即 30 岁以下)的离婚者比例低于 30-40 岁、40-50 岁两个年龄段的离婚者比例。

那么,在独生子女人口进入婚姻阶段以前相同年龄段人口的离婚比例又是如何呢? 吴丽敏等对山东威海、荣成、曲阜、海阳四个城市 1994-1996 年的 4709 件离婚案件的统计分析表明,“离婚当事人在 35 岁以下者占 80%”(吴丽敏、程延平,1998)。如果以 1995 年为时间点计算,这 80% 的离婚者(20-35 岁)的出生时间处于 1960-1975 年之间,即他们都没有进入独生子女出生的年代。张布对江苏南通市青年离婚情况的调查表明,“该市 1982 年离婚数为 113 对,226 人,其中 35 岁以下的青年 140 名,占离婚总人数的 61.9%”(张布,1984);倪金仲等对北京市宣武区法院 1983 年至 1984 年 7 月所审理的 1075 件离婚

① 前述统计中使用的是调查当年“婚姻状况”为离婚的人口数,而不是调查当年“发生”离婚的人口数。此处上海的数据则是 2008 年“发生”离婚的人口数。

② 原文数据如此,由于计算时略掉了 60 岁以上人口,故与总数有一定差距。

③ 该计算以离婚总人数为分母,由离婚总对数 36811 乘以 2 得到。

案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离婚者中 20-35 岁的占 65.4% (倪金仲、任国钧,1986)。李伟民对邯郸市邯山区青年离婚案件的抽样调查结果也表明,“1984 年,发生离婚纠纷案件 174 起,其中 35 岁以下的 129 对 258 人。青年离婚案件占全区离婚案件的 74%”(李伟民,1985)。上述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的调查中,青年离婚者的出生时间都在 1960 年以前,都没有进入独生子女出生的年代。

这七项离婚调查统计的结果都表明,在已婚独生子女人口出现以前,离婚者中年龄在 20-35 岁的人的比例很高(占到了 60%-80%);而当已婚独生子女人口出现以后,离婚者中 20-29 岁(即包含独生子女人口的部分)的比例却大大下降了(只占到 30%左右)。尽管不同调查的年龄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即使将目前独生子女所在年龄段的离婚人口按调查统计数据推算到 35 岁,其比例也大约只在 45%左右,还是要明显低于独生子女出生以前的离婚比例。

从上述全国统计数据以及各地调查结果的纵向比较中,都无法推导出独生子女离婚比例提高的结果。因此,媒体关于“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的第二个逻辑结果也没有被证实。

而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离婚比例的比较情况,可参考吴瑞君等人的研究。该研究利用上海市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稳定性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5 年 20-30 岁上海户籍的已婚独生子女人口中,离婚与再婚人口占全部已婚人口的比重,男性为 1.68%,女性为 2.04%,均略低于非独生子女男性和非独生子女女性。“说明迄今为止,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同时代的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婚姻稳定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吴瑞君、汪小勤,2009)。由此可见,这一结果也不支持“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的结论。

因此,媒介新闻对独生子女离婚比例高的负面宣传、将他们描绘成婚姻不稳定的负面形象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当然,以上数据中有一部分出自地方调查,要想将其结果推论到总体,还需要利用全国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如果有分年龄和独生子女身份的年度离婚统计数据,对这一问题的证明将更为直接、也更为有力。

(二) 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是否更差?

许多媒介新闻在评价独生子女性格特征方面的问题时,常常不自

觉地将他们与以往的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这样比较的结果实际上很可能并不是独生子女所具有的特异性,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青年之间的差别。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横向比较,即将独生子女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这样得到的结果才是独生子女所具有的特异性。根据这一思路,笔者利用2007年全国12城市在职青年调查的结果^①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一部分性格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与一般调查中被调查者直接评价独生子女的做法有所不同,本次调查采用了被调查对象自我评价的方法,即在不涉及有关独生子女话题的前提下,测量独生子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对自身性格特征的主观评价。具体结果见表4。

表4最后一列的统计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总共10项特征中,独生子女的自我评价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自我评价只在懒惰这一项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别(二者相差12个百分点),而在其他9项特征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别。笔者10年前对中学生所做的同一主题的调查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风笑天,2000)。

表4 下列各项特征中,哪些符合你的情况? (%)			
性格特征	独生子女自评	非独生子女自评	差异显著性检验
懒惰	49.6	37.6	$P < .01$
娇气	22.8	20.4	$P > .05$
任性	48.4	44.3	$P > .05$
孤僻	21.3	17.4	$P > .05$
自我中心	32.2	35.1	$P > .05$
交往能力弱	29.1	36.3	$P > .05$
难与人合作	9.8	10.8	$P > .05$
自私	19.8	24.8	$P > .05$
自理能力弱	28.7	23.6	$P > .05$
责任心差	10.7	12.8	$P > .05$

如果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价与其实际表现基本相符,那么,表4的结

① 本项调查的对象是1976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城市在职青年。样本采用按比例分层的抽样方法进行抽取。样本规模为2357份,其中,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在职青年为1245名,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样本。有关该项研究具体方法的详细介绍可见风笑天,2009a。

果说明了两点:一、以同龄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标准,城市在职青年独生子女的性格特征并未显得格外不同。^① 如果同龄非独生子女是正常的人群,那么,独生子女总体上也是正常的人群。因此,媒介对他们的性格特征的负面宣传,将他们描绘成普遍有性格缺陷的负面形象很可能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二、从表4中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具有负面性格特征的青年(包括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都只是总体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它一方面说明,在社会现实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些存在这样或那样性格缺点的独生子女(以及非独生子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如果用这一小部分独生子女身上的负面特征来代表独生子女的整体特征,那将是不正确的和不合适的。

(三) 独生子女结婚后是否总是到父母家“蹭饭”?

笔者利用2008年对五大城市已婚青年夫妇的调查资料来对此进行分析和验证。^② 我们知道,到父母家“蹭饭”有两个前提,即青年夫妇要和父母住在同一城市,但又不住在一起。根据这两个条件在样本中进行筛选,共得到410对符合条件的青年夫妇。调查中对他们在上一周去父母家吃饭的餐数进行了统计。方法是將一周中去父母家吃饭次数在4餐及以上作为“总是”或“经常”的标准;同时将青年夫妇分成“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一方为独生子女”以及“双方均为非独生子女”的三组(即双独、单独和双非)进行比较;考虑到青年夫妇目前是否有孩子可能会对他们去父母家吃饭的行为有影响,所以在统计分析中对这一变量进行了控制。表5就是三类夫妇到父母家吃饭频率的交互统计及其卡方检验结果。

从表5的结果看到,双独夫妇经常去父母家吃饭(每周4餐及以上)的比例略多于单独夫妇和双非夫妇,但其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检验的显著性。它说明,总体中三类青年夫妇在是否经常去父母家吃饭的分布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媒介新闻报道中有关独生子女

① 当然,性格的自评结果并不等于性格的心理学测量结果。如果将来有直接的心理学测量结果的支持,本研究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

② 该项调查的对象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是在1975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城市青年夫妇。调查地点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五大中心城市。样本的抽取采用多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样本规模为1600个个案。调查实际成功完成有效问卷1216份。有关该研究具体方法的详细介绍可见风笑天,2009b。

婚后经常到父母家“蹭饭”的判断和评价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表 5		上一周 7 天中 ,你们有几餐是去父母家吃的?			(%)
		夫妇身份			合计
有无孩子	到父母家吃饭餐数	双独	单独	双非	
无孩子	0 - 3 餐	79. 3	81. 9	82. 1	80. 8
	4 餐及以上	20. 7	18. 1	17. 9	19. 2
	(n)	(82)	(83)	(28)	(193)
Chi-Square = . 225			Df = 2	P = . 894	
有孩子	0 - 3 餐	76. 1	81. 7	83. 6	81. 1
	4 餐及以上	23. 9	18. 3	16. 4	18. 9
	(n)	(46)	(104)	(67)	(217)
Chi-Square = 1. 051			Df = 2	P = . 591	

(四) 独生子女对孩子是否“只生不养”?

同样利用 2008 年五大城市已婚青年夫妇的调查数据 ,我们对样本中 657 对有 0 - 6 岁子女的青年夫妇“目前孩子主要由谁照料”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考虑到孩子年龄不同 ,需要父母照料的情况有较大差别 ,因而分析中根据孩子的年龄将调查对象分为有 0 - 3 岁、3 - 6 岁孩子的两组来进行控制。同时 ,依旧将已婚夫妇分为双独、单独和双非三类来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 6、表 7。

表 6		有 0 - 3 岁孩子的青年夫妇孩子主要由谁带?			(%)
		夫妇身份			
		双独	单独	双非	Total
我们自己带	31. 6	40. 3	56. 1	41. 5	
双方父母带	46. 9	41. 3	39. 0	42. 3	
保姆带	21. 4	18. 4	4. 9	16. 2	
(n)	(98)	(196)	(82)	(376)	
Chi - Square = 16. 027		Df = 4		P = . 003	

表 6 的结果表明 ,当孩子处于 0 - 3 岁之间时 ,三类夫妇中主要照

料孩子者的分布有显著不同。双独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最少,单独夫妇其次,双非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最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将孩子交给双方父母带的比例明显比双非夫妇高(三者的比例差不多)。实际上,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较少,主要是因为他们请保姆带孩子的比例明显比双非夫妇更高。

表 7 有 3-6 岁孩子的青年夫妇孩子主要由谁带? (%)

	夫妇身份			Total
	双独	单独	双非	
我们自己带	48.0	47.5	70.7	55.2
双方父母带	40.0	42.4	29.3	37.7
保姆带	12.0	10.1	.0	7.1
(n)	(50)	(139)	(92)	(281)
Chi-Square = 18.482 Df = 4 P = .001				

表 7 的结果表明,当孩子处于 3-6 岁之间(即上幼儿园阶段)时,三类夫妇中主要照料孩子者的分布依然显著不同。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自己带的比例有所提高,交给保姆带的比例相应减少,而交给父母带的比例则依旧维持在 40% 左右。不同的是,双非夫妇交给父母带的比例进一步减少,自己带孩子的比例明显上升。形成了双独与单独之间没有差别,这二者与双非之间差别明显的状况。笔者分析,造成双非夫妇这一变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往往会面临其他子辈同样的带孙辈的需要。因而,当这个孩子度过了 0-3 岁最困难的抚育阶段后,更多的双非夫妇客观上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了。

综合表 6、表 7 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孩子年龄较小时,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的确比双非夫妇少,但是,一方面,这种较少的比例有可能是他们的父母更积极、更主动地(甚至是双方父母争着)要带他们的孙辈所造成的,而不一定是年轻夫妇自己不想带或不会带造成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带孩子的比例较少是以请保姆带孩子的比例较高作为补充的(若加上请保姆带孩子的比例,则三类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相当)。而总体上,三类夫妇将孩子交给父母照料的比例实际相差并不大。这种结果说明,独生子女并非像媒介新闻所报

道的那样,自己不养孩子,完全将孩子交给父母养。他们请保姆带孩子,实际上孩子还是在他们身边。这与将孩子完全交给父母带是不同的。此外,双非夫妇自己带孩子的比例相对较高的原因,究竟是他们“既生孩子又养孩子”的主观表现,还是他们相对缺少父母支持的客观结果,也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果,可以看出,大众媒介关于独生子女的离婚比例高、性格特征不好、常去父母家“蹭饭”、对孩子只生不养等方面的评价和描述,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并不支持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表现所给出的负面评价。

六、大众媒介建构独生子女负面形象的方式和逻辑

在本小节中,我们将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一些定性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闻报道并不是学术论文,因而,我们分析的重点不是放在对其观点的讨论上,而是放在其得出各种观点和评价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所使用的推断逻辑上。换句话说,我们主要集中说明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的负面评价为什么不能成立,以揭示这些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妖魔化”的方式和机制。受篇幅限制,仅列举上述20篇新闻报道中的两篇为例进行分析。

新闻报道1:“80后”独生子女离婚多。^①

这篇被媒介转引频数最高(75次)的新闻报道的标题,或许正是这篇新闻报道获得高转载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是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目前,婚姻濒临破裂而走进婚姻咨询室的人群比例中,有一半是20多岁的年轻人。而来自广州一家律师所的数字显示,“80后”委托离婚或咨询离婚的案例也明显在增多。全国妇联婚姻指导师项目督导员胡慎之教授分析,“80后”独生子女成为离婚高发人群,跟父母从小过分溺爱,凡事帮孩子拿主意,养成孩子缺少忍

^① <http://news.sina.com.cn/o/2006-12-11/103310736706s.shtml>

让性、宽容度有直接关系。

据全国妇联婚姻指导师项目督导员胡慎之介绍,仅今年以来,他就接待了 20 多名“80 后”夫妻的婚姻咨询。……而在去年以前,因为夫妻不和闹离婚来求助的约有 90% 以上都是 30 多岁至 40 多岁的青壮年人,现在 20 多岁的年轻人已占了半数之多,他们绝大部分都是 1980 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另外,这些年轻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闪婚”一族,普遍都是认识两三个月就“闪电式”结婚。

首先应该指出,“80 后”并不等同于“独生子女”,不能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国家统计局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独生子女仅占“80 后”人口(即 1980 - 1989 年出生者)的五分之一。不仅 90% 以上的农村“80 后”不是独生子女,即使在城市“80 后”人口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也只有 36.3%,即三分之一多一点。因此,在对独生子女进行评价时,要将他们从“80 后”中分离出来;不能将属于整个“80 后”一代的特征和问题都归结到独生子女身上。

该报道得出独生子女离婚率高的评价时,所依据的是有关“80 后”的两条事实,但接着引用专家分析时,评价的对象却变成了“‘80 后’独生子女”。这里须要区分到底是“80 后”离婚多,还是独生子女离婚多?因为,即使“80 后”成为了离婚高发人群,也并不意味着独生子女就是离婚高发人群。而且,“走进婚姻咨询室的人”,实际上也并不一定是“离婚的人”。这里的关键是:该报道在没有事实依据证明独生子女是离婚高发人群的前提下,就来分析和总结他们成为离婚高发人群的原因。

另外,如果说这些离婚的青年夫妇中,“绝大部分都是‘闪婚’一族”,那么,就更不能证明“80 后”或独生子女离婚多。因为“闪婚”族实际上是“80 后”或独生子女中十分特殊的一部分,他们恰恰代表不了更多“非闪婚”族的“80 后”或独生子女。这种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错误推理逻辑是:当接触到的都是有问题的孩子时,就推导出所有的孩子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从媒介新闻所列举的这些特殊对象中,是得不到有关一般的、普通的对象的结论的。而媒体的新闻报道中采用这样的标题,很容易在受众心目中形成“独生子女容易离婚”的负面印象。这是媒体“妖魔化”独生子女的一个典型例子。

新闻2:独生子女父母“只生不养”。^①

该新闻首先援引《北京晨报》一份针对“独生子女婚姻”的问卷调查结果,说明“被调查对象中,超过70%的‘独生子女’年轻父母‘只生不养’将孩子的养育抛给双方父母。由年轻妈妈照顾小孩的家庭仅占15.8%”。接着,对于上面的调查结果,记者借专家之口做出了下列看似权威、但实质上有很大偏见和错误的分析和提示:

专家分析指出20出头的独生子女夫妇,本身还是大孩子,也缺少带弟弟妹妹的经历,再加上忙于事业,在养育子女方面往往手足无措。大部分独生子女在生活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未“断奶”现象,婚前对父母经济依赖,婚后是养育小孩的依赖。这很容易培养出新一代的“皇帝孙”。

这个提示的问题很明显。比如,它没有弄清这是什么方面的专家做的分析;再如别人的调查清楚地写着“调查对象平均年龄29岁”,可报道中却要突出“20出头的独生子女夫妇”,以说明他们还是“大孩子”。这种主题先行、观点先行、根据观点来找材料的做法,是其不当之一。把独生子女“缺少带弟弟妹妹的经历”作为他们不会带孩子的原因,这是其不当之二。其推理逻辑是:

缺少带弟弟妹妹的经历就不会带孩子;(大前提)

独生子女缺少带弟弟妹妹的经历;(小前提)

所以独生子女不会带孩子。(结论)

这里的关键是:缺少带弟弟妹妹的经历就不会带孩子吗?如果继续问下去:过去的父母都是靠带弟弟妹妹的经历来带孩子的吗?实际上,由于新闻报道中所暗示的大前提是错误的,所以,其结论也难以成立。至于新闻中借用专家之言,把独生子女描绘成“婚前对父母经济依赖,婚后是养育小孩的依赖”的无用的、不能自立的一代,则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即使双独夫妇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没有带孩子,也不能说就是他们“只生不养”,因为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由于双独夫妇双方的父母抢着带孙子造成的。

上述两个例子虽然不能代表所有媒介新闻的情况,但至少能提示,

^① <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2/155812716863s.shtml>

一些被广泛传播的媒介新闻报道是怎样制造、形成和夸大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的。笔者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所采用的事实太特殊。虽然新闻报道中所采用的事实或许都是真实的,但是由于“新闻采集常常只限于能使事件突出的事实”(德弗勒、丹尼斯,1989:440),因而其所采用的事实常常是极端的和片面的。用社会研究方法的术语来说,新闻报道在采用事实方面的错误是“选择性观察”。他们较多地采用典型的、个别的、特殊的事实,特别是偏向于采用那些与他们头脑中事先形成的、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形象相符合的事实,而忽略掉许许多多与他们的期望不相符合的例子以及与他们的想法相冲突的信息。显然,对于反映整体的客观现实来说,仅有这样的事实往往不够。

二、所采用的分析方式不科学。对于常识、传统、经验和权威的依赖,是一些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对独生子女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和评价的最主要方式。但恰恰是在这几种既普遍存在、又相对易得的知识来源中,夹杂着大量的偏见和负面刻板印象,容易形成对现象的错误认识。更为严重的是,“旧观念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强化。对得上号的人就被用作证明,对不上号的就当例外被抛弃”(莱本,1994)。

三、所采用的推理逻辑不正确。此类新闻中最常见的推理逻辑是一种以点代面,在不具备任何必要前提的情况下,直接由特殊推及一般、由个别推及全体。这是其误导受众“妖魔化”独生子女形象的关键。实际上,在此类新闻所报道的特定事实与他们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之间,往往并不能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

七、总结与讨论

(一) 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媒介新闻报道进行系统的内容分析,表明国内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而将实地调查结果与大众媒介的报道进行比较,证实当前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形象与独生子女在社会中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现有调查统计数据所涉及的四个方面的结果,都不支持大众媒介所建构的独生子女负面形象。通过对典型的媒介新闻报道所采用的方式、材料和逻辑

的进一步解析,本研究发现媒介新闻常常以错误的方式和逻辑得出对独生子女的认识、观点、评价和结论。研究结果揭示出一些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在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妖魔化”倾向。

(二) 若干问题的讨论

首先,关于独生子女负面刻板印象的来源问题。英国学者莱本指出:“独生子女问题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一方面,流行的偏见将独生子女看成是孤独的和被宠坏了的;另一方面,调查勾勒出一个独生子女的完整形象:聪明、合群、环境适应性强。许多调查者都注意到了世俗的偏见与调查证据的分歧,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偏见来自何方?”其回答是:“许多历史性的解释争论未决,其中包括19至20世纪鼓励提高出生率的政策及宣传、小量的带诽谤性的调查报告以及文学中对独生子女持反对态度的描述”(莱本,1994)。

目前我国社会中的情况与莱本所描述的十分相似:一方面是社会中大量存在着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偏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得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并无大的差别的结论。那么,我国社会中对独生子女的这种偏见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少数不科学的调查结果以及类似“中国的小皇帝”那样的文学作品对独生子女的负面评价可能会对人们的认识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更大的,当推本研究揭示的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妖魔化”倾向。正是在大众媒介的推动下,社会形成了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刻板印象。正因为如此,莱本指出:“由调查报告勾画的独生子女正面形象应当家喻户晓”(莱本,1994)。这或许也是今后我国学术界在独生子女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任务。

其次,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之一是其学术成果应该转化成为大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知。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天生的信息传播功能,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著作出版等以外,大众传播媒介也是社会科学成果向大众普及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论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种知识总会在社会生活领域传播,并且常常是不系统、不全面、不科学的。因此笔者认为,学术界的社会研究不仅需要针对大众媒介和社会舆论的各种误解进行质疑和展开探讨,同时也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用研究成果去影响大众媒介。

第三,关于媒介新闻的生产及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问题。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使我们有理由特别关注和研究媒

介新闻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后果,以及大众媒介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大众媒介的组织形式和媒介新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媒介新闻的生产与大量从事该工作的从业者有关。从新闻主题的选取、新闻素材的收集,到对客观事实的取舍、直至新闻标题的确定,都与这些从业者的新闻理念、价值取向、认知方式、知识素养、专业技能有关。这些从业者既包括一线的记者、编辑,也包括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机构负责人。大众媒介的目标不能只是吸引受众的眼球,同时也要对应该如何建构社会现实,如何正确影响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有清醒的、正确的和充分的认识。

最后,关于对包含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内的“80后”一代人的认识问题。与长时期、大范围的负面刻板印象相比,2008年以来大众媒介对“80后”一代人的评价有了较大的转变,特别是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对这一代人的正面评价显得特别突出。比如“有责任的一代”、“觉醒的一代”、“成熟的一代”、“敢于承担的一代”等等。这正说明部分媒体以往对这一代人的认知和评价并不符合实际。只有抹去了遮盖在这一代人面孔上的浮尘,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只有去掉眼前的有色镜片,我们所看到的才是他们真实的本色。

参考文献:

- 安·莱本,1994,《英国的独生子女:成见与调查结果》,姚安译,《当代青年研究》第3期。
- 包蕾萍,2008a,《中国独生子女刻板印象、影响因素及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上海“家庭: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与责任”国际会议论文。
- 2008b,《独生子女公众观的变迁:一种刻板印象的社会心理溯源》,《当代青年研究》第6期。
- 2009,《中国独生子女刻板印象的实证研究》,待发表。
- 风笑天,1992,《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0,《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2002,《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江海学刊》第5期。
- 2005,《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教育研究》第10期。
- 2009a,《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社会科学》第1期。
- 2009b,《城市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关系》,《学海》第5期。
-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1996,《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8,《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黄刚,1990,《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及其意义》,《心理发展与教育》第2期。
- 金美子、李光哲、池明花,2006,《延吉市4776起离婚案社会学调查报告》,《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第1期。
- 李伟民,1985,《关于青年离婚案件的抽样调查》,《河北法学》第5期。

- 梅尔文·德弗勒、埃弗雷特·丹尼斯,1989,《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王怡红、张跃宏、刘乃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1990,《大众传播学诸论》,杜立平译,柯雄校,北京:新华出版社。
- 倪金仲、任国钧,1986,《对当前城区离婚状况的调查》,《政法论坛》第3期。
- 上海市宝山区妇联,2008,《家庭危机的防治和介入——上海市宝山区离婚状况调查与思考》,《中国妇运》第10期。
- 吴瑞君、汪小勤,2009,《我国独生子女群体的婚姻稳定性分析》,《学海》第5期。
- 吴丽敏、程延平,1998,《当前离婚案件上升的特点、原因及对策》,《山东审判》第5期。
- 张布,1984,《南通市青年离婚情况的调查》,《人民司法》第1期。
- 张国良,2001,《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其俊,2009,《中老年人离婚逐年增多》,《文汇报》7月23日。
- Blake, J. 1981, "The Only Child in America: Prejudice versus Performanc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7(1).
- Claudy, J. G. 1984, "The Only Child as a Young Adult: Results from Project Talent." In T. Falbo (ed.), *The Single-child Famil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ooper, C. R., H. D. Grotevant, M. S. Moore & S. M. Condon 1984, "Predicting Adolescent Role Taking and Identity Exploration from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 Comparison of One- and Two-child Families." In T. Falbo (ed.), *The Single-child Famil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Falbo, T. (ed.) 1984, *The Single-child Famil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Polit, D. F. 1978, "Stereotypes Relating to Family-Size Statu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0(1).
- Polit, D. F., R. L. Nuttall & E. V. Nuttall 1980, "The Only Child Grows up: A Look at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Only Children." *Family Relations* 29(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谭 深

begging gospel and seeking national-state for the lepers , the medical missionaries brought the hygienic modernity to China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ld tradition in Ming-Qing. In a word , they gave up the “forced-isolation institution” in Ming-Qing and introduced the “humanistic-isolation institution” for lepers , and to both relieve leper’ s physical sufferings and christianize them.

Homeowners’ Committees , Faction Politics and Local Governance: A study in a Shanghai neighborhood *Shi Fayong* 13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Homeowners’ Committe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urban local governance. The paper finds that , alth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associations was due to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 which had been initiated by the state , their actual operation is affected by local social networks. As far as their “external” effects on the wider polity is concerned , the establishment of homeowners’ committees provides citizens opportunities and channels to participate in neighborhood politics and enhances interest articulation and interest aggregation , which in turn promotes community autonomy. Internally , however , the extensive deployment of informal networks within the associations may lead to the oligarchy of a few privileged citizens , the exclusion of other citizens and the formation of faction politics , undermining loc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democracy.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 Types of NGO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from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ism and civil society theory *Fan Minglin* 159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 typ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the social service field ,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make an in-depth examina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s and develop a preliminary ty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ism and civil society theory. By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types into the discussion , the paper tries to better describe the curr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domestic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Only Child’s Negative Image in Media *Feng Xiaotian* 177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age of the Only Child in mass media news repor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age

is mainly a negative one. Compared with the survey results , obvious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image and preferment of the Only Child. With the analysis of formation mode , narrative logic and the materials used in media reports ,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was obvious demonizing tendenc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 of the Only Child by mass media.

COMMENTARY AND DEBATE

A Review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on Family ...	
.....	Tang Can 199

Abstract: This review covers major works on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on family in the west during the past five decades. Discussions are made on important theories in the field and their latest developments. Criticism and revision to this approach are also included. One-dimensional and linear theories on family changes have been questioned. It is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family changes may occur by various approaches with complicated and complex models. Family structure has been replaced by family relations as the analytical paradigm for studying family chage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 the simplistic typology of traditional versus modern has been rejected.

BOOK REVIEW

The Restor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 Decline: Reading Albert O. Hirschman , <i>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i>	Shi Puyuan 223
--	----------------